

可以
觸摸的
民國

現場

去一趟現場，
看老新聞老評論，
嘗一嘗“原味民國”。

游 民 政 治

黃遠生 / 著
陳協 / 選編

陝西人民出版社



游民政治

黄远生 / 著
陈协 / 选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游民政治/黄远生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3

(可以触摸的民国)

ISBN 978 - 7 - 224 - 10442 - 4

I. ①游… II. ①黄… III. ①时事评论 - 中国 - 民国 - 文集
IV. ①D693.09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4193 号

游民政治

作 者 黄远生

主 编 石钟扬

编 者 陈 协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发货联系电话 (传真): (010) 88203378

印 刷 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6 开 19.75 印张 31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10442 - 4

定 价 39.00 元

民国相关选题的出版，曾经是敏感的。那一度被僵化思维固锁住的，是太多面目模糊的身影。他们长袍马褂、旗袍绣履，那光影婆娑的身姿，一旦跃入脑际，就难再轻易离去。这也是近年来不管是影视还是图书，都出现了一股民国热的因缘。

有关民国的话题，似乎隐藏着一种魔力。那种潜游在净空深处的味道，从历史的不远处，静静地向我们移来。我们无法抵抗这种黑白质感的诱惑。然而，太多的民国是演绎的产品、是虚构的华章，民国真实的样子不应仅仅从名人、类名人的塑造中诞出，不应仅仅在华丽炫耀的镜头感里展示。民国绝不是“万恶的旧世界”，也不是“消失的亚特兰蒂斯”，她是我们的先人曾经在纠结中不断尝试和追索的第一次现代，是灿若星辰的文化人第一次放胆展示自我。同时，传统与现代的角力，保守与开放的争夺，西学与中学的通融，专制与民权的恶斗，极度的聪明和极度的愚蠢，极度的崇高和极度的可笑，都在这个时代充分表演，并给后人埋下了种子。所以我们的关注，不只是行注目礼，更是寻求还原，寻求真实，不管热血与极端，也不管沉郁与凉薄，这既是叙述对象的真实，也是原作者的真实。

《可以触摸的民国》系列丛书，我们计划分成几个子系列构建，目前即将出版的有：《可以触摸的民国·现场》《可以触摸的民国·侧影》《可以触摸的民国·细看》以及《可以触摸的民国·新学》。

《现场》板块，由南京财经大学的石钟扬教授执行主编，首选了四本：“报界奇才”、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专职记者黄远生的新闻文选；中国新闻教育与研究的先驱、“铁肩辣手”的杰出记者邵飘萍的新闻文选；“思想界明星”、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领袖陈独秀所主编《新青年》、《每周评论》中的新闻与时评选集；“五四三圣”之一、“再造文明”的设计师胡适的时评选。这四位报人（无论专职或兼职的）都是学者型的，都曾为民主为言论自由历尽艰辛，饱经磨难，透过这些依旧在燃烧的文字，可以触摸到他们滚烫的热血。

《侧影》板块，由我们编辑部操刀策划，编选民国著名学者、文人的文字，希冀觅得特殊视角，给读者一个陌生化的全新印象。譬如，傅斯年不仅是儒雅严谨的学者，我们编选的《现实政治》更展示出他对时事的敏感与睿智；徐志摩的《再来跑一趟野马》，集

其相关政论问题的文章，发现一个敏感政治、关心国家的徐志摩；朱自清的《人话》，选取他回忆性的散文篇目，串联起他的一生，搭建出朱自清的“忆之路”。

《细看》板块，则是结构别致的人物传记类原创性文本。回避宏大叙事的框架限制，省略过渡、延续的平淡，截取他（她）人生的一个个断面，或熠熠生辉，或苦痛难当，从一个个鲜活生动的细节出发，去触摸他们灵魂深处的颤抖，如《萧红的100个细节》《郭沫若的30个细节》等。

《新学》板块，作者皆为民国文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对民国的态度有其自成体系、自圆其说的创新，如《民国元年——历史与文学中的日常生活》，选取这样被反复述说的特殊年份，却回避了政治，只看那剧变之下惶惑迟缓而跃跃欲试的百姓生活，对当下社会现状亦不乏启迪。

因为民国版图书的出版年代所限，文字中不少具体的用法，比如其中《人话》一篇中“您少爷在那儿上学？”的“那儿”、《春晖的一月》一篇中“我最爱桥上的阑干”的“阑干”，又或者《买书》一篇中“不知那儿检来《文心雕龙》的名字”的“检”字等，在现在的汉语环境中已经有了不同的用法，但为了尊重民国时代的真实性，以及作者自主创作的主权性，我们没有进行任何擅改。脚注部分属选本中自有的，我们尊重并保留。为了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编辑也针对具体的、可能有助读者理解的部分，增添了一部分注解。

作为编者，请允许我们向胡适、朱自清、徐志摩、傅斯年们致意。让我们一起从他们的文字上感知陌生而久违的率真、趣味和正直，倾听他们告诉我们知识人应该怎样读书、怎样生活，怎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形而上的问题。无论侧影，还是正面，在煌煌民国的文化殿堂前，我们都该收敛起自己虚张的声势，勇于正视那逼人的光焰。我们撩拨出的民国文字中的独特味道，是想与读者分享先生们带给我们的温暖与感动。请惠存我们的好意，同时宽恕我们的浅识。

民国何在

总序
石钟扬

民国何似？

删繁就简，用几句耳熟能详的俗语或可尽其意。一曰“多事之秋”，文争武斗，各路英雄“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二曰“内忧外患”，外患最大莫过日寇入侵；内忧先是南北对峙，继而国共内战。三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张之洞说晚清的话，移说民国更确。1912年10月10日民国成立，宣告在中国延绵数千年帝制的终结，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诞生。然而民主共和的理念与制度，在那充满着“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几乎从来没有实质性地实施过，更不用说到1949年民国从名到实都在大陆上消亡了。

蔡东藩在《民国通俗演义》开篇一声惊呼，几乎成了贯穿民国始终的关键词：

共和在哪里？民主在哪里？

从1912年到1949年，对于民主共和，有人惶恐，有人摧残，有人盗名欺世，也确实有人为之呼唤、为之解说、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百川归海，风云际会，于是有了民国景观、民国气质乃至民国精神。评头论足，民国人与前清人，一眼即可分辨，当陈独秀、鲁迅们一挥剪剪掉脑后的辫子就告别了前清，那乍看“像茶壶盖样”的发型就是民初男人的风貌；女人裹了多少年的小脚放开虽恢复不了天足，但这“半大脚”毕竟有别于前清的三寸金莲。这就是民国。这是全体国民的民国，非某党某派的民国。

民国也有过感天动地的精彩。文的莫过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她是中国文明史上最壮丽精神日出，且不说振聋发聩的思想启蒙，仅文白之争就改变了中国数千年的书写传统，明白无误地把中国人带到了现代化的思维空间。武的莫过于八年抗战而至胜利，使蒙羞百年的中国人第一次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共论世界大事。

民国而今安在？

抚摩着从旧书店淘来的《民国丛书》、《新文学大系》，翻阅着《图说民国》的老照片，寻觅着老北大老清华乃至西南联大的故事，抖动着久挂橱柜里的中山装，听听中山路上有百年树龄的梧桐在西风中窃窃私语，登临在夕照下仍然巍峨的中山陵……那民国的趣味、民国的习俗、民国的风尚……演绎成的所谓“民国范儿”，还若隐若现在我们生活中。民国百年生日临近，逼着或诱着人们问苍茫大地：民国离我们到底有多远？透过“民国范儿”遗存，仿佛还依稀见到民国那饱经沧桑的背影。

子曰温故而知新。人类总是要不断从历史中去吸取打造当下迈向未来的智慧与动力。何况民国毕竟不是遥远的历史，它当初剪下“尾巴”散落的毛发可能还在我们客厅的某个角落呢。

这些年人们似乎已经听厌了那些被粉饰或被肢解了的帝王将相的故事，于是民国故事渐渐成了热门话题，从而有了大量的关于民国的历史著作与文学作品（包括影视）。该如何评价这种文化现象，或说当代写民国的书呈何境界？恕我孤陋寡闻，不敢置喙。偶闻有云，历史除了人名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文学除了人名是假的其余都是真的。乍闻不免惊讶，转思觉得此说未免太高看文学而低看史学了。好在其似乎并非专说有关民国文史的。历史是追忆中的民国，文学是想象中的民国，由此走近民国本无可厚非。而我们突发奇想，能否寻找一条非文非史的途径去看民国，以避

高明之识。民国有大量的民办传媒，“花自己的钱说自己的话”，他们为道义与良知而写作，真正成为“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者”。他们对民国大小事情的现场报道（新闻）与现场评论（时评），堪称民间版的“民国实录”（历朝实录都是官方的），这本是民国难得的一道文化风景线。生活之树长青，生活有时比文学更好玩，来自生活第一线的报道自然也是如此。这些“民国实录”还未来得及加工成史著，也还没有被制作成文学，将之选编出来，或许能让人们一睹民国真容——一个原汁原味的民国。

民国报刊浩如烟海，民国报人人才济济。我们这套“民国现场”丛书首选了四本。第一是“报界奇才”，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专职记者黄远生（1885—1915）的新闻文选；第二是中国新闻教育与研究的先驱——具“铁肩辣手”之称的杰出记者邵飘萍（1886—1926）的新闻文选；第三是“思想界明星”——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领袖陈独秀（1879—1942）所主编《新青年》、《每周评论》中的新闻与时评选集；第四是五四“三圣”之一——“再造文明”的设计师胡适（1891—1962）的时评选集。

这四位报人（无论专职或兼职的）都是学者型的。黄远生十九岁即考中进士，邵飘萍十四岁、陈独秀十七岁即秀才及第，胡适更有神童之称，他们都有留学或域外工作的背景，旧学新知兼备。又都有“铁肩担道义”的担当，更不乏“辣手著文章”（明人杨椒山原句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邵飘萍易“妙”为“辣”，更见风采）的身手。他们“纪述则须眉毕现，评议则山岳为摧”。人称“自黄远生出，而新闻通讯放一异彩”，甚至认为“不看过他的通讯，就不配谈民国初年的政治动态”（曹聚仁语）。冯玉祥将军则曰“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还说他“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绝奋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他”。陈独秀始终站在体制外，充当“终身的反对派”，其以“天下第一刊”《新青年》和专为议政的《每周评论》，传播“救时的圣药”——科学、民主，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至今仍与时俱增。胡适虽终其一生不属任何党派，却是坚定的“有政府主义者”，无论作政府的净友还是净臣，他都在为制度文明的再造作不懈的努力。胡适主张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包医百病”的抽象主义，针对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包括如何当校长、党魁，如何当总理、总统，都有过设计，以谋求一点一滴的进步。

这四本书的主旋律是从不同角度追寻：共和在哪里？民主在哪里？而用科学启迪民众的愚昧，用民主抨击当局的专制，在陈独秀与胡适那里则

来得更自觉些、更理性些；他们鼓吹以法治国，于是呼唤“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政？”他们主张将人权置于一切政治权力之上，于是宣称“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无论是黄远生、邵飘萍，还是陈独秀、胡适，都曾为民主、为言论自由历尽艰辛，饱经磨难。黄远生、邵飘萍还为之献出了宝贵生命，黄被刺杀时仅三十岁，邵被枪杀时也才刚刚四十岁。这些人类的良心，真可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这四本书，有三本是从作者（黄、邵、胡）已有的文集或全集中选出的。其中《远生遗著》无新式标点，需要重新标点，颇为费事。（掩卷之余，不免感慨，不知那些治中国新闻史的教授们都忙什么去了，远生死去快百年了，他的文集还是素面朝天，无人整理。）《新青年》、《每周评论》的那本则是从原刊中捞出来的。为此，让四位少帅忙乎了整整一个暑假，每本书都是汗水泡出来的。若读者欢喜，我们的辛苦就值。

2011年8月31日于南京秦淮河畔

守
正
陈
协

为民生社会请命

——黄远生与他的新闻实践

在短短四五年的记者从业生涯中，他怀抱着为社会立言、为民众鼓呼，对当政者进行监督的激情，怀抱着在险恶的政治旋涡之中，超然于政党之外无所偏倚地“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的梦想，以笔为刀枪，以数百篇真气淋漓、锋利畅达、鞭辟入里的文章，揭露了民国初年云谲波诡、黑幕重重的黑暗现实。他无所畏惧地“指斥乘舆，指斥权贵”，笔锋遍及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大小军阀、政客、爪牙及帮闲，体现出了在乱世中纵横捭阖、叱咤风云、激扬文字的勃勃生气。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不断揭露现实的丑陋与黑暗的同时，犹自扪心抚躬，审视并追

问作为大众精英与代表的知识分子自身人格、灵魂的萎靡与困顿，“以灵魂的忏悔作为自己新生的洗礼，作为人格超升的支点”，从而在严苛的反省与忏悔中实现了人格的自我升华。他，便是被誉为“报界之奇才”、“中国新闻通信的创始人”的著名记者——黄远生。

黄远生（1885—1915），原名为基，字远庸，“远生”为其笔名，江西九江人。他出生于“文采秀发”的书香门第，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中举，第二年会试中进士，与沈钧儒、谭延闿等同榜，成为清末最后一批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个。遂以即用知县分至河南任知县，然绝意仕进，经再三请求，终以新进士资格东渡扶桑官费留学，入日本中央大学专攻法律。宣统元年（1909年）学成回国，任邮习部员外郎、参议厅行走等职。因痛感清朝末期国事弥艰，内外交困，民生凋敝，且朝政腐败、贪墨成风、人心涣散的残酷事实，终不甘“以极可爱之青年之光阴，而潦倒于京曹”，辛亥革命后，遂立誓“吾之官乃与满廷俱毕”，“立意不做官，不做议员，而遁身于报馆与律师”，从而开始了人生中短暂而辉煌的记者生涯。他先后受聘于《申报》、《时报》、《东方日报》，任驻京特派记者，后又在《少年中国》、《庸言》、《东方杂志》、《国民公报》等报刊担任主编、记者或撰稿人。他视野开阔，胆识过人，才思敏捷，笔力雄健，针砭时弊，激浊扬清，短短数年便名噪于世，成为蜚声全国的著名记者。

1915年秋，袁世凯称帝复辟闹剧徐徐开启，冀借重远生之名声为其复辟造势，遂有意罗致黄远生于门下。于是，先是强邀黄远生担任御用的《亚细亚报》上海版的总撰述，后又派人向黄表示：若能撰写一篇赞成帝制的文章，则将酬谢十万元重金，并奉送一个部长的席位。迫于袁世凯的淫威，黄远生在拖延多日后，只得违心写了一篇“似是而非”、自己以为“主旨尚未过于没缺良心”的文章聊以敷衍。袁世凯读后极为不满，威逼其重做。黄远生在“人格上争死活的最后一关”，在权势与良知的逼迫煎熬之间，毅然选择了良知。1915年9月3日，他只身逃离北京，南下上海。随即在上海《申报》、《时报》、《大陆报》刊发启事，声明与袁世凯御用的《亚细亚报》脱离关系，并宣称因《亚细亚报》旨在“鼓吹帝制”，而与自己“宗旨不合”，故“不愿与闻”。为暂避政坛旋涡，不久即赴美远行，临行前发表的《忏悔录》，对“魂为躯役”、“理欲交战”、“既不能为真小人，又不能为真君子”的人生经历及自我灵魂作了严酷的自我解剖，并希望从此“为自己立下新的生活目标”。令人扼腕的是，黄远生

在逃脱了袁世凯的迫害之后，不料却被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负责人林森视作附袁走卒，1915年12月25日，被林指派的枪手刘北海在旧金山都板街枪杀，时年仅31岁。1916年年初，黄远生遗骸由驻美公使顾维钧护送回上海，并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梁启超、严复等各界名流纷纷撰挽联志哀。远生挚友林志钧经多方收集整理，耗时四年，将散见于各种报刊的远生作品，汇编成《远生遗著》四卷，由梁启超题写书名，于191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综观黄远生的创作实践，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珍视：

一、独特、开阔的认识视野

黄远生出身于书香门第，黄府崇尚诗礼传家，曾祖、叔伯父等皆先后考试及第，或为进士，或为举人，家学渊源深厚。远生自小在父母的督促下，为圆科举之梦，饱读经史古籍，由此也奠定了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底蕴。随着年岁渐长，目睹了清政府昏聩腐朽、国事渐趋糜烂的残酷现实。清晚期西学东渐，“中体西用”理念一时盛行，在新人耳目并对绵延数千年的封建历史、文化的痼疾产生了一定冲击之后，维新派知识分子又几乎都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作为拯世救乏的灵丹妙药，“不进则退”，当初活跃于时代潮头的一代思想先驱开始逐渐蜕变为文化守成主义者，思想渐趋枯窘，继而改良之路也渐次陷入泥淖，而“五四”新一代彻底反封建反传统的文化斗士则尚处于痛苦、迷惘、困惑与探求期间。黄远生正是在这新旧交替的十字路口，以其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充满激情的大声疾呼，填补了时代的一个空白。

其实，早在南浔公学求学期间，黄远生即对学校开设的理化、史地等“新学”颇有兴趣，并对介绍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书籍有广泛的涉猎，尤其是对日本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报人福泽谕吉情有独钟。留学东瀛期间，福泽谕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封建主义相继没落的原因的反思，为未来日本的振兴所指明的“改造国民”、“以欧洲文明为标准”、“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的思想，以及其创设新报，普及新知，强调独立自主、主持公论、不偏不党的独特办报理念，对远生后来的思想以及职业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作为一个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小国，从被迫开港到明治维新，竟然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内便达到了奋发自强的目的，并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1905年的

日俄战争中战胜清朝、俄国之后，一跃而为世界列强之一。而反观清王朝，从鸦片战争、五口通商始，无论是戊戌变法或是洋务运动均相继失败，数十年光阴过去，却积贫积弱依旧。因此，随着明治维新之后东亚邻国的振兴，新一代知识分子传统文化心理的彻底坍塌，以及对新的救亡图存之路的思索与探索也就势在必行。如果说梁启超所倡导的“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的理念，或许还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士大夫阶层所特有的居高临下、耳提面命式的启迪民智、“去塞求通”的思想启蒙，那么黄远生所力主的“夫欲改造国家，必须改造社会；欲改造社会，必须改造个人”的思想，则是从日本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有益经验中看到了守成无望的真正之因，因而在貌似与梁氏不谋而合的同时，则更多地体现出以国民个人的自觉改造为起点的一种崭新的思想——从自身至社会再至国家的崛起振兴路径。

或许正是因为具备了这样的认识视野，才是促使黄远生归国不久即“弃绝功名”，并毅然选择记者职业的真实原因，从而也使其办报宗旨、写作立场、写作方法等有了与众不同的色彩与风格。

二、“指斥权贵”，督责政府，“为民生社会请命”的办报宗旨

民国初年的报刊言论，诚如黄远生在《平民之贵族，奴隶之平民》、《少年中国之自白》等文中所言：“报馆之呼号而不平，或为大总统之私，或为政府之私，或为官僚之私，或为党会之私，或为豪强雄桀奸商著猾之私，固有丝毫分厘为民生社会请命者乎？”“举国言论趋于暮气，趋于权势，趋于无聊之意识，不足以表现国民真正之精神。”因此，他在《庸言》、《少年中国》等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逐步阐明了自己的办报理念：办报应“支持政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一新政治或社会之空气”；办报应“指斥权贵”，督责政府，“对于今之总统、政府、政党、议院及言论界，尽相当之忠告”，“以公明之正义督责之”。

黄远生认为，记者应关心民瘼，“为民生社会请命”。因此，充当民众耳目、社会喉舌也就成为记者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缘于这种认识，他对民国初年的社会痼疾、社会成员的阶级构成的认识与分析可谓清醒而独到：“今日中国无平民，其能自称平民，争权利争自由者，则贵族而已矣。农工商困苦无辜，供租税以养国家者，所谓真平民也，则奴隶而已矣。”而得“享全国最高之俸”者则“最多不过百万”，“而三万万九千九百万

之国民，则皆呻吟憔悴，困苦颠连”，“非大总统及政府之所能顾念而怜悯，非舆论机关之所屑为代表而呼吁”。他进而质问：“今日中国是否多数人幸福，抑系少数人幸福？”由此，他警告统治者，“多行不义必自毙”。同时也对唯权贵马首是瞻、漠视民生疾苦的无良媒体、记者发出忠告，如果不能真正承担为民生鼓呼之职责，而只知一味“造作文字，遇事生风”，丝毫无益于“衣食我而恩厚我之同胞”，“今若有人创议曰，此少数者昔可杀，则记者必先自服上刑矣”。由此可见，在黄远生的心目中，舆论为公众服务，为民生社会请命鼓呼，既是其从事新闻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奠定其新闻思想的基础。

也正是在这种理念的观照之下，他把辛亥革命之后“争功攘利者盈途，窃位素餐者载道”的政坛乱局直斥为“徇私弄权，无异前清”，“我国之政治舞台，乃有黑幕而无明幕”。而究其实质，“不过去一班旧食人者，而换取一班新食人者”，而“官僚之侵蚀者如故，独夫之荼毒如故”。对于袁世凯极力扶植个人势力，而惯于用金钱、官位笼络收买之伎俩，他讥讽为“彼以为天下之人，殆无有不能以官或钱收买者”，而其结果是“鸡鸣狗盗之士，天下以袁门为最多”。由此，他认为当今“政局之日趋于险恶者，非他人为之，乃袁总统之自为之也。彼等及今而不改此度者，则吾国命运可以二言定之，盖瓦解于前清，而鱼烂于袁总统也”。他甚至把袁氏为首的统治集团描述为“百鬼昼行，万恶皆聚，私蠹阂塞，危亡在前，而不为动”。其胆略之过人，识见之独到，指摘之犀利，于当时殊为罕见。

三、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客观、真实、公正的写作立场

黄远生认为，新闻应严格尊重事实，客观公正，秉持超然于政党、政治之外的独立立场与价值判断。他在《本报之新生命》一文中指出：“吾曹此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故吾曹对于政局，对于时事，乃至对于一切事物，固当本其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之主张，但决不以吾曹之主张为唯一之主张，决不以一主张之故，而排斥其他主张。”即便“有所主张”，也应“视综合事实”而下“判断”，而当事实不足以作出判断时，与其“凭恃理想”妄发空论，不如“仅仅提出事实”，以供社会参考。因此，“演绎的理论，决不如归纳的事实之多”。总之，黄远生认为，报刊记事造言，应“洞察物群，周知利病”，应秉持“公心”，超越政党或个人一己狭隘之私。他对民国初年“聚千奇百怪之人”而形成的“千

奇百怪之党”互为仇讎的党争乱局深恶痛绝，认为“今日无真正政党”，政党是“万恶之傀儡”，并严正警告“不许此两派私人势力，借政治为口实，而相与赌民国之基础为胜负”。在远生看来，民国初期的所谓政党，实际是由各种“贤愚不肖”、鱼龙混杂之徒组成的渔利集团，其实质是借政党之幌子，使“个人野蛮之势力”得“匿于完全组织之下以伸张之”，从而达到“划分全国为若干势力范围”之目的。政党首领们“日日相隐于腹剑蜜舌之下”，其党徒们则“日日以血肉相搏，而攫食地方之余利”，乃至出现“我是国民党，非非国民党者，皆吾友也，于是鸡鸣狗盗之徒皆入之；我是共和党，非非共和党者，皆吾友也，于是又一派鸡鸣狗盗之徒入焉”的荒唐场景。为了超越现实政治，避免舆论成为私利的工具，他主张记者要“超然不党”，“主持清议”，“附以忠告”，“无所偏倚”。为此，1913年他登报公开声明，“自今以往，余之名字，誓与一切党会断绝连贯的关系。”“不党”的目的就在于为了保持独立的价值判断与立场。在对待当时最大权势者袁世凯的态度上，他既反对囿于政见之私、不以国家为念而“谩骂而盗贼之”的“儿戏”心理，又反对沦为“袁氏之家奴与走狗”而绝对“依赖之”及“神圣之”的“奴隶”心态。平心而论，黄远生的许多论点，在当时确实是一语中的，切中时弊的。

四、强调新闻记者的基本素养，提出著名的“四能”说

为了实现真实、客观、公正、超然的新闻原则，黄远生着重强调新闻记者的基本素养，提出著名的“四能”说。“新闻记者须有四能：（一）脑筋能想，（二）腿脚能奔走，（三）耳能听，（四）手能写。”“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存在，以时访接，是谓能奔走；闻一知十，闻此知彼，以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求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黄远生认为，作为新闻记者，必须深入实际，做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兼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方面的综合素养；应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广泛接触社会各界，洞悉世事，勤于走访，适时掌握第一手资料；应具备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能力，善于发现表象背后所隐藏的本质；最终形之于文，应尊重事实，尊重彼此人格，反对“凭臆造论，吠影吠声”。他对民国初年的大借款事件、走马灯似的内阁频繁更迭、张振武遇害案件、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出笼始末等的报道，都是建立在对社会各界广泛走访，深

人挖掘所掌握的完备的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之上的，而“正确的材料”，“合法的态度”，与事主对证明白，具证完备，“分析清楚，研究精细”则是其写作的必要手段。

五、自创变格，首开新闻通讯之先河

在黄远生的新闻实践中，颇受人关注的是其对新闻表现形式及表现方法的探索与创新。其贡献主要有：将文学笔法引入新闻表现领域，善于捕捉细节，并善于将典型细节以场景描摹的方式，刻画人物“须眉毕现，影无遁形”，针砭时弊“发聋振聩，暮鼓晨钟”，无不将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绘声绘色、形神毕具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善于在新闻报道中引入多样化的表达方式，将叙述、描写、议论、抒情适时融于一体，嬉笑怒骂，庄谐兼备，极大地丰富了新闻的表现手段；不拘一格，自创变格，“首创了通信这一独立的新闻文体”，并以连续报道纵深挖掘的形式拓展了新闻的表现空间，其形式除了常见的记述体之外，还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日记体、书信体、漫谈体等，无不新奇独特，涉笔成趣。《外交部之厨子》、《囍日日记》、《三日观天记》、《新闻日记》等即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

六、严苛的自省意识与忏悔精神

1915年，黄远生发表于《东方杂志》的《忏悔录》一文，以同时代知识分子所罕见的坦率与真诚，对自己的以往的人生经历及灵魂煎熬的心路历程作了全面的审视与深刻的反思。黄远生身处的时代，正值中国由封建制度向民主制度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近代中国社会最黑暗、最动荡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个对祖国前途满怀热忱的爱国主义者，他向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渴望从中借鉴有益的经验，从而使灾难深重的国家由此走向强盛复兴之路。也正是心存此种希冀与梦想，才使其毅然弃官转投新闻界，并对启迪民智、督责政府的新闻报国理想抱持着一份独特的心仪。而随着袁世凯帝制复辟步伐的加剧，且身不由己卷入政治旋涡无力抗争，最终只能无奈逃遁，早先“无所偏倚”主持清议、督责政府的梦想也随之彻底破灭。面对足以令人“魂以瘐死，一死不可复活”的专制淫威，终不愿依附权势自甘堕落而沦为“人头畜鸣者”，又“绝无能力与思想足以自定其归宿”，而“只能听之运命”、“非驴非马”的现实人生以及“既不能为真小人，亦不能为真君子”的现实困境，痛切地认识到，“似一身分为

二截：其一为傀儡，即吾本身，另自有人撮弄，作诸动作；其一乃他人之眼光，偶然瞥见此种种撮弄，时为作呕”。在“本我”与“非我”反复缠斗的灵魂煎熬之中，他并没有一味止于外向的社会批判，将自我“堕落”全部归咎于外力的逼迫与驱使，而是更多地转向对“个人秘史”的历数与检视，反躬追问和解剖自身的人格分裂。正如许纪霖先生所说，“黄远生意识到自己思想的黑暗，但他却无力驱散这黑暗；他向往人格的光明，渴望自我的新生，但却眼睁睁地看到社会的黑幕与内心的蠹虫吞噬着自己的灵魂；他鄙视传统的自我，却又缺乏一个崭新的自我足资自信，于是‘赤手空拳，无一物可把持’，痛苦地踟蹰在光明与黑暗、新生与僵死的交替之中。”而这种悲剧，不仅仅是黄远生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新旧交替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悲剧。尽管他认为造成“堕落”既有“自身之原因与社会的原因”，但“推究病根所在，由于生活太高，嗜欲太广，思想太复，道力太乏而已”。痛定思痛，他直面“魂为躯役”的不堪人生，以自戕的方式剖析自身“罪恶”，拷问自我灵魂，并进而明确了走向新生的自我救赎之路：“夫欲改造国家，必须改造社会；欲改造社会，必须改造个人。”并决意“既自今，提倡个人修养，提倡独立自主，提倡神圣职业，提倡人格主义”。他意识到言论救国的无望，转而对现代意义的文艺启蒙寄予厚望，并将其视作“国命民魂所系”的神圣事业。他认为最根本的方法是“从提倡新文学入手”，“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省。而其要义，须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须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在此，严苛的自省意识与深沉的忏悔精神，终于使忏悔者的灵魂得以净化与拯救，灵魂涅槃，超越自我，并由此走向新生。

光阴荏苒，近百年时光已悄然消逝。如今，重读黄远生的意义，在于让我们真切回眸民国初期那一段风雨如晦的铁血历史的同时，又可深切感受近代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理想破灭，自身无可逃遁、无所归依的迷茫与彷徨，深切体味其在乱世中对中华崛起的不竭渴望与不懈探求。